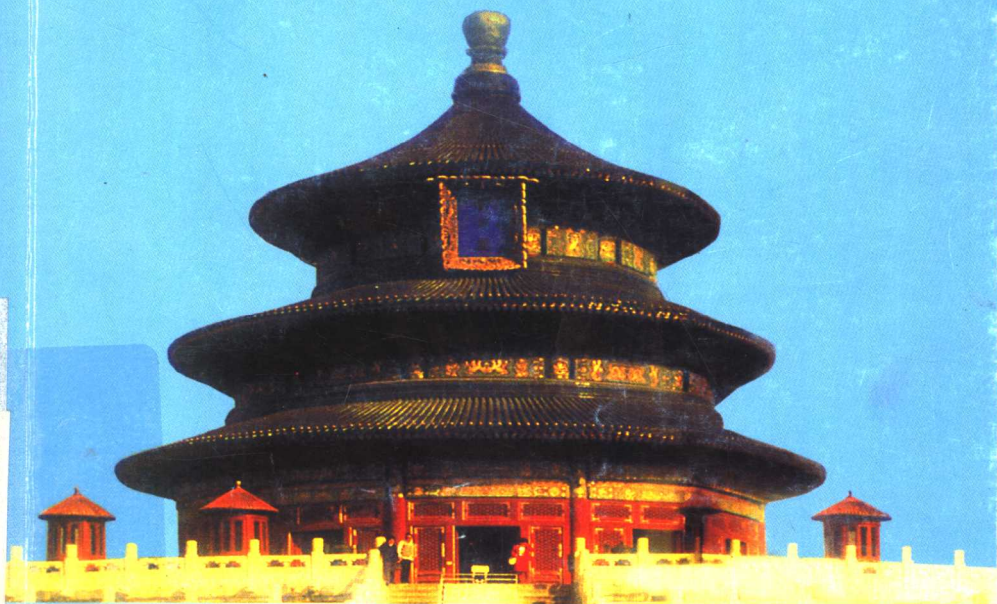


WENHUA DAODE DEYU

文化·道德·德育

王殿卿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CHINA INDUSTRY & COMMERCE ASSOCIATED PRESS

WDC
16
G4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学校中华美德教育与社区道德建设互动研究”成果

文化·道德·德育

向母校80周年大庆献书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六二届毕业生王殿卿

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

责任编辑:王玉璋

封面设计:童行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道德·德育/王殿卿著. -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4

ISBN 7-80193-146-7

I. 文… II. 王… III. 德育 - 研究 - 中国 IV. G4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2308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100027 电话:64153909

网址:www.gslcbs.com.cn

中国伊协月华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850 × 1168 1/32 印张:10.5 25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93-146-7/D·4

定 价:30.00 元

前 言

10年来,我连续承担了北京市和教育部的三个五年规划的研究项目,主题是大中小学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在研究实践中,需要不断向参与教育实验的校长、教师、家长以至海内外人士,回答有关这项实验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种种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关于文化、道德、德育三者内在联系的问题。文化是学校德育的根,道德是学校德育的魂,德育是承传文化与道德的载体。学校德育若离开民族文化的根,就会变成断了线而随“风”飘荡的风筝,若失去民族美德的灵魂,便成为用标语和口号糊成的竹筐。文化与道德都是人的生活,更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与实践,离开文化与道德,学校德育就难有生机和实效,就会变成一连串“正确”而僵化的教条。要培养学生成人、成才,做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需要祖国文化的滋润,离不开民族美德的浸染。

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应是建设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特色学校德育的基本路向。要研究道德及其教育,就必须研究中华传统美德,而要研究中华传统美德,又必须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是,我按照这个思路去读书思考,去总结第一线教师的经验,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整合,把一时想明白的问题列出提纲,到参与教育实验的地区和学校去讲座、培训校长和教师。讲的次数多了,听到的反馈也多了,我就再学习、再请教,天长日久形成了一些比较清晰和相对稳定的思路,现将其整理成书,作为“十五”课题的一项成果,奉献给参与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校长和教师,并求教于关心未成年人中华美德教育的各方领导和海内外专家,更是献给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成立 10 周年的一份薄礼。

书中所引用的资料不会尽如人意,所阐发的观点也难免幼稚,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日臻完善。在成书的过程中,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尤其是本书责任编辑王玉璋先生,给予大力支持,在此特致感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文化反思与文化建设	(1)
第一节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末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2)
一、从“中体西用”到“兼收并蓄”	(3)
二、“西方中心论”与“殖民地文化心理”	(5)
三、从“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	(5)
第二节 “走自己的路”与中华文化历史命运的新转折	(8)
一、“中国特色”与中国文化	(8)
二、文化观念的变革与新的文化自觉	(9)
三、儒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新定位	(18)
第三节 文化建设与中国文化再次走向世界	(29)
一、中国进入了文化建设的新时代	(31)
二、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	(34)
三、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39)
第二章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	(44)
第一节 从“四大发明”到“四书五经”	(46)
第二节 利玛窦发现与传播中国文化	(47)
一、决意“向中国人宣传福音”	(47)
二、建“寺”隐“堂” 借“佛”传“耶”	(48)
三、用西方“圆形”地图改变中国人的“天圆地方”观	(50)
四、疏“佛”近“儒” 融入主流社会	(52)

五、糅合“耶儒” 推动“儒学西传”	(53)
第三节 欧洲百年“中国文化热”	(54)
一、康熙与路易十四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	(55)
二、欧洲人“重新发现了中国”	(57)
第四节 中国儒家思想与欧洲现代文明	(60)
一、中西文明的融合与欧洲的启蒙思想	(60)
二、儒学与西方经济学	(63)
三、儒学与西方哲学	(65)
四、儒学与西方民主	(66)
五、儒学与西方的平等、竞争	(68)
六、儒学与西方道德	(69)
七、儒学与西方教育	(70)
第三章 文化与德育	(72)
第一节 文化是民族的生命	(73)
一、民族文化与民族的兴衰	(73)
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76)
三、军事占领与文化征服	(78)
第二节 “文以载道”的德育观	(80)
一、语言文字与德育	(81)
二、蒙学与德育	(85)
三、经典与德育	(89)
第三节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95)
一、“人”与“物”，“道”与“器”	(96)
二、文化生命的传递	(97)
第四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校园文化	(99)
一、校园文化的民族性	(99)
二、校园文化与校训	(100)

三、校园文化与学校建筑文化	(101)
四、人文课程与人文讲座	(102)
第四章 新世纪对道德的呼唤	(106)
第一节 “代价论”及其代价	(107)
一、对美国“性文化”的评说	(107)
二、家庭解体降低了新一代国民素质	(110)
三、青少年中的性混乱对未来人口结构与素质的 威胁	(113)
四、性商业发达对社会道德的摧残	(114)
五、性自由给艾滋病的传播火上浇油	(116)
第二节 新世纪对道德的呼唤	(121)
一、新世纪面临的道德难题	(121)
二、联合国对道德重建的新贡献	(123)
三、中国开始了道德建设	(126)
第三节 寻求人类共同伦理	(128)
一、全球伦理与“底线伦理”	(129)
二、中国儒学与全球伦理	(131)
三、全球伦理与现实伦理	(132)
四、全球伦理与和而不同	(133)
第五章 道德及其价值	(136)
第一节 道德及其发展	(137)
一、“道”与“德”	(137)
二、明人伦	(141)
三、道德发展	(143)
第二节 道德与经济	(146)
一、道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方向和动力	(146)
二、企业道德与企业形象	(147)

三、道德与契约经济	(148)
第三节 道德与政治	(151)
一、“立国为民”与“以德治国”	(152)
二、“以德治吏”与“为政以德”	(153)
三、“道德教化”与“以德治国”	(155)
第四节 道德与法律	(156)
一、道德与法律同源一致	(157)
二、道德与法律相对存在	(159)
三、道德与法律作用互补	(159)
第六章 中华传统道德及其现代转化	(163)
第一节 中华传统道德	(163)
一、中华道德精神	(163)
二、中华道德的历史演变	(165)
三、中华道德修养论	(170)
第二节 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	(173)
一、孙中山、蔡元培对中西道德的融合	(174)
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再认识与新转化	(177)
三、中华美德与公民道德	(180)
第三节 中华道德与东亚文明	(183)
一、中华伦理与日本文明	(185)
二、中华伦理与韩国文明	(189)
三、中华伦理与新加坡文明	(197)
第七章 建设中国学校德育	(202)
第一节 寻求中国学校德育新定位	(202)
一、学校德育在理论上的回归与科学定位	(202)
二、学校德育在实践中的新定位	(205)
三、中华美德在学校德育中的新定位	(207)

第二节 研究和借鉴美国学校道德教育	(210)
一、美国学校道德教育历史演变的启示	(210)
二、“价值中立”与“心理教育”	(219)
三、失败的性教育	(223)
第三节 借鉴亚洲“四小龙”学校德育	(230)
一、新加坡学校的“东亚价值观”与《儒家伦理》教育 ..	(231)
二、韩国学校的“忠、孝、礼”与公民道德教育	(237)
三、中国台湾学校的《生活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 ..	(240)
四、香港学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	(251)
第八章 中华美德德目及内容体系	(263)
第一节 当今急需建构中国学校的德目新体系	(263)
一、中国古代德目体系的参照	(263)
二、建构德目新体系的探讨	(264)
第二节 传统德目的现代转化	(266)
一、“忠”的本质是一种“责任”	(266)
二、孝是生生不息的爱心	(269)
三、诚是求真务实的品质	(274)
四、信是立身兴业的基点	(276)
五、礼是人际文明的规范	(278)
六、义是人间正道的向导	(282)
七、廉是清白正气的根基	(284)
八、耻是人之为人的底线	(286)
第三节 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内容体系	(289)
一、中小学教育实验用书	(289)
二、高等学校教育实验用书	(294)
第九章 学校德育与社区道德建设互动	(297)
第一节 “互动”的理念与模式	(299)

一、“互动”是道德教育的核心理念	(299)
二、家庭、学校、社区三维互动	(301)
三、学校内部的道德教育互动	(302)
第二节 学校与社区互动的内容、载体与机制	(304)
一、“年”与“节日”是学校与社区互动的结合点	(304)
二、“过中国年”的实验	(305)
三、学校与社区互动的运作机制	(314)
第三节 学校的“孝育”与社区道德建设互动	(315)
一、历来政府兴孝道	(315)
二、当代百姓创造现代版“孝经”	(316)
三、当代学校的“孝育”	(318)
四、“行孝”不“愚孝”	(321)
第四节 学校“礼”的教育与社区礼的建设互动	(324)
一、礼的价值及其建设的定位	(325)
二、开发中华民族“礼”的教育资源	(326)
三、当代“礼”的教育重在培育人格	(326)
四、在师生互动中进行礼的教育	(328)
五、学校与社区“礼”的互动	(330)

第一章 文化反思与文化建设

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套生活方式。自有了人类,就有了文化。人类的起源,就是文化的起源。人类以自身的创造智慧,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利用环境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化。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就是文化。文化的第一个特征是普遍性,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在亚洲,有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在埃及,有尼罗河文化。在中东,有巴比伦文化。在欧洲,有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延续性。无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权如何更替,文化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的特征之三是积累性。文化都是积年累月,逐渐演变,由简至繁,由粗到精,日新月异发展而成的。文化的特征之四,是差异性。不同社会、地区、时代、民族的文化,在内容、形式、功能以及发展的水平,都会有差异。文化的门类繁多,诸如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形态文化,人与自身和人与社会关系的精神形态文化,规范人类群体生活秩序的制度形态文化等等。在当今,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现。

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得以生存和发展,需要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觉,社会就会变得像失去了灵魂一样,在无序状态中盲目地横冲直撞。^①

^① 李庆本:《2002年香港“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纪要》,见《炎黄春秋》第10期。

21 世纪是文化的世纪。21 世纪的社会是以文化为基础的知识社会。21 世纪的竞争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智力竞争。任何国家若想在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中胜出,都必须通过建设先进文化来增强国家发展的原动力。^①

作为精神形态的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产生巨大影响。它包括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更包括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与时俱进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精神形态的文化是整个文化的核心,它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它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内在动源,它是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学校德育的重要任务是传承民族文化,提升新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推动精神形态文化的建设。

第一节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末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一个国家的文化状态与其综合国力及其历史命运息息相关。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每个历史辉煌时代都是以文化鼎盛为标志,向世界进行文化传播与辐射并参与人类文明建设的时期。但是,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为一个贫穷、衰落的“东亚病夫”,从而中国的文化也在世界范围内,变成了一种弱势文化,它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步履艰难。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人开始寻求对策,是在已有民族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从而整合新文化,还是放弃民族文化“全盘西化”,就成为近百年来中国人不停的文化争论与选择。1978 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在中国人调整自己发展道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① 白钦:《文化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见《光明日报》2003 年 7 月 10 日 B4 版。

国际影响空间迅速扩大的形势下,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与策略上,从“革命”转向了“建设”。20世纪末的这种文化战略的转变,为中华文化在21世纪再次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直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这一关系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題,至今还在继续。^①

一、从“中体西用”到“兼收并蓄”

清代晚期,即19世纪的后50年。是西方强势文化开始冲击中国文化的50年,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中国人开始反省自己的文化,并思考与探索如何将东西两种文化精华的融合,整合中国的新文化。“中体西用”是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选择。“中体”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学及其伦理道德,“西用”是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在这种文化意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兼收并蓄”整合中国文化的新理念。文化的深层变革导致了学校教育的方针与内容的巨大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面对民族危机,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首的改革派,纷纷著书立说,抨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宋代儒学,倡导“经世致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了变革“中学”、学习“西学”的新时代。此后,洪秀全、洪仁玕等效法西方“拜上帝”、拆孔庙,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大胆的冲击。1860年,冯桂芬最早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即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得到了洋务派的认

^①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见《炎黄春秋》第10期。

可,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纲领。

1895年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多种形式宣传进化论、民权论以及西方各种政治社会学说,在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基础上,进入了学习西方制度文化的新阶段。

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效法英国的君主立宪而失败;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法兰西的民主共和为榜样。孙中山主张中西文化融合,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现代转化。蔡元培主张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贯通中西,表明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发展新趋势,为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文化在中国传播,开拓了新的环境。

文化的现代化必然导致教育的现代化。戊戌维新派将“兴学养才”、“广开民智”作为振弱救亡之道,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法令,在全国范围自上而下推行学校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变革,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开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近代学制和教育内容,兼习中西学,并开办京师大学堂,1896年6月15日,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这些都是戊戌维新期间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① 维新派的这些教育主张,只有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才得到了落实。教育总长兼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仅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并且亲自编写《修身》教科书。这对后来学校制度、科学教育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蔡元培还提出了“兼收并蓄”的文化新方略,对“中体西用”加以发展,为吸收外来文化精华、整合新文化开出了新河,也为新生的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的摇篮,奠定了思想基础。

^① 见1998年9月22日《中国教育报》。

二、“西方中心论”与“殖民地文化心理”

从 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每况愈下。在西方一些人的心目当中,中国似乎只有愚昧与落后,没有文化与文明。弱国无外交,弱国在文化上也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在日本人“脱亚入欧”思想影响下,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文化也逐步失去了自信,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前进的精神阻力。

在西方,将中国传统文化看做“阻力”的代表人物,是德国人马科斯·韦伯。他在 20 世纪初撰写和出版了两部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道教与儒教》。他认为,欧洲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市民社会的飞快发展,是得益于一种精神动力,即以新教伦理为灵魂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近代之所以贫穷、落后,不能实现市民社会,正是由于缺乏西方那种精神动力,传统的道教与儒教,是国人的精神桎梏。韦伯这种以西方是非论是非的“西方中心论”,不仅开脱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与反动,也掩盖了西方列强对中国长期侵略与掠夺的历史罪过。然而,他的这套“理论”,却被当时一大批中国的精英所接受,逐渐在中国人当中形成了一种文化自卑的情绪,似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落后的、保守的,阻碍社会进步的。这使得中国人长期在世界面前挺不直自己的文化脊梁。这种片面而非理性的思维定势,就成为近百年来“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武器,成为东方殖民地的一种“殖民地文化心理”。而这正是导致历史文化发生断裂的一种思想根源,如果不进行矫正,民族文化的生命就难以恢复自己应有的活力。

三、从“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殖民地文化心理”影响深远,先是“五四”运动,后是“文化大革命”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泛滥的一股思潮。长达 70

余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成为被批判、被打倒的革命对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其不容置疑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对待中国儒学过分偏激,以至逐步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使人们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普遍的抵触情绪。这既与西化思潮冲击有联系,同时也是接受西化思潮的一种思想基础。其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受到过严格的古典文学(化)的训练,而所接受的大量文化资料是鲁迅、胡适、陈独秀、巴金等人的白话文著述。因此,一讲“国民性”,马上就会想到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和奴性;一讲中国的传统,就是胡适笔下的女人裹小脚、歧视妇女。将中国文化中某些糟粕看做是整个中国文化,显然是以偏盖全。遗憾的是,这种偏激的文化观,却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五四”运动打破了原来封建性的一潭死水,又是“泼洗澡水,连同孩子一齐泼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自己的文化并未“当家做主人”。从《红楼梦》、《海瑞罢官》到《水浒》等文化名著及其研究这些名著的著名文人,都被拉上阶级斗争的“审判台”。

“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然而,它的真正历史过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扫荡和大破坏。以“扫四旧”为名,焚烧了大量传世古籍,毁掉了无数文物古迹;大批文化名人被戴上“反动权威”的政治帽子,惨遭迫害;以“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为名,对儒家思想以及中华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批判和否定。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导,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日益泛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应仅仅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要给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平反”,从国人的观念上重塑中国文化的新形象,使新一代国人挺直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文化大革命”中对儒学的批判与否定,不仅是“反传统”的新